

江陵田桢考

范晓萌

湖北省图书馆

摘要：民国湖北藏书家田吴炤之父田桢，是清末民初湖北江陵地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士绅，他自称宋代著名藏书家田伟的后裔，着力于藏书、校书、刻书，主持校勘和刊刻《明张文忠公全集》，负责校订《江陵乡土志》，还刊刻了《移山堂丛书》四种，并积极参与清末江陵地区的教育改革。他的学术思想和新学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子田吴炤。

关键词：江陵；田吴炤；藏书家；清末教育改革

民国湖北藏书家田吴炤，热衷新式教育，其译作《初等心理学》《普通教育学要义》均有移山堂丛书本，许多研究称其为田吴炤之自刻本，乃至将移山堂归为田吴炤之堂号，然而实际上，此二书均由田吴炤之父田桢所刻，只因田桢作为一个最高只做过贡生的地方乡贤，名声不彰，而其藏书观念、新学思想都为名声更著的儿子田吴炤所继承发扬，遂致混淆。本文以湖北省图书馆馆藏文献为基础，拟对田桢之生平及经历作一考证。

一、田桢的生平

田桢其生平事迹，府县志均未载，惟以曾主持刊刻《明张文忠公全集》留名。检各图书馆藏书目录，与田桢有关者有以下几种：

明张文忠公全集，清光绪二十七年红藤碧树山馆刻朱印本，湖北省图书馆藏。牌记镌“光绪二十七年红藤碧树山馆重刊”，有田桢所作“凡例”，言校书、刻书事。有影印印章“江陵田桢”、“尊父一字幼叟”、“荊州田氏自宋以来藏书之家”、“移山”。

明张文忠公全集，清光绪二十七年红藤碧树山馆刻本，湖北省图书馆藏。牌记左下钤“荊州府城本祠藏版”印，并钤“逯山老人手校”“逯山”“尊父一字幼叟”“江陵田桢”“国子先生”“荊州田氏自宋以来藏书之家”“湖北省文物整理保管委员会藏书之印”印。

荊州记，清光绪二十七年移山堂刻移山堂丛书本，湖北省图书馆藏。牌记镌“光绪二十有七年荊州田氏移山堂重雕”，并钤“逯山老人手校”、“荊州田氏自宋以来藏书之家”、“逯山”印。书末镌“皇清光绪二十有七年辛丑嘉平江陵田桢尊父重刊”，并钤“移山老人手校”印。

普通教育学要义，清光绪二十九年刻移山堂丛书本，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此书为田吴炤所译。

生理卫生学，清光绪刻移山堂丛书本，北京大学

图书馆藏。此书为田吴炤所译。

初等心理学，清光绪二十八年刻移山堂丛书本朱印本，南开大学图书馆藏。此书为田吴炤所译。

[宣统]江陵乡土志，清宣统元年抄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末书：“……校订 国子监学正衔 田桢……”。

拼音代字诀，清光绪三十二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有光绪三十二年江陵移山老人田桢序。

综合各书信息，可知田桢为湖北江陵人，字蓴（蕇）父，一字幼叟，号移山、移山老人，有移山堂、红藤碧树馆。关于田桢的家世，《江陵县志》载：“田世贵，妻陈氏，子上遇，妻黄氏。姑媳皆青年早寡，日勤纺绩以抚子孙，其孙桢入邑庠，盖两世苦节所致。陈享寿六十六，黄守节历四十余年。”^[1]知田桢之父为田上遇，祖父为田世贵，均早逝，田桢幼时家境清贫，依靠祖母及母亲供养才考入县学。到光绪二十七年重修张文忠公祠堂时，田桢在科举之途进了一步，成为“邑贡生”，并且作为颇有名望的当地乡贤，可以主持祠堂的重修计划，负责校刻《张文忠公全集》。此后他担任过江陵的荆南书院监院，至迟在宣统元年，又得授国子监学正衔，并在当年被选为湖北省咨议局候补议员^[2]。可见田桢是一位在江陵当地颇具影响力的士绅领袖。

关于田桢、田吴炤的父子关系，湖北省图书馆藏《明张文忠公全集》各卷末刻有“邑人田桢校男炤侍校”“邑人郑之英田吴炤校”字样，案是书为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田桢自刻，田吴炤已在光绪二十六年7、8月间自日本成城学校学毕回鄂，自然有时间参与校订工作。田桢字蓴（蕇）父，田吴炤字小蓴（尊），田桢有“荊州田氏自宋以来藏书之家”印，田吴炤亦有“田伟后裔”“有宋荊州田氏七万五千卷堂”等印，二人均自称为北宋藏书家田伟的后裔。综上可知，所

谓“男炤”即为田桢之子田吴炤。

湖北省图书馆所见田桢藏书有两种，一为《明张文忠公全集》清光绪二十七年红藤碧树山馆刻本（即田氏自刻本），钤有“逡山老人手校”、“逡山”、“尊父一字幼叟”、“江陵田桢”、“国子先生”、“荆州田氏自宋已来藏书之家”印；一为《荆州记》清光绪二十七年荆州田氏移山堂刻本，钤“逡山老人手校”、“荆州田氏自宋以来藏书之家”印，均为自刻之书。

二、田桢之校书、刻书活动

清代光绪年间，满洲人夷良出任荆宜施道观察使，追慕前人，乃与江陵知县张振纲共议重新刊刻张居正文集，而身任其事的正是江陵人田桢，据他自述称：“兹刻倡于夷召南观察良捐廉筹款发凡起例，授桢使董校刻……桢以衰病，躬任讎校……”^[3]，其所据底本为江陵邓氏翻明本，后又自邑人处得明刻本和安化陶澍刻本，三本互相比勘，改定脱讹，而“无从参验者一仍其初”，《女诫直解》一卷，田桢亦依据殿本《后汉书》加以校正，均见其对于校勘的审慎态度。此外，田桢还将张居正身后之评论、诗文加以收集考证，编辑成《附录》一文，所收录“张文忠公遗事”一文后有双行小字三百余字的考据，所述大约为张居正、张四维不合之事，尤可见田氏心血所在。

田桢的刻书活动还包括刊刻移山堂丛书。移山堂号，此前的研究者都将其归为田桢之子田吴炤，如王亮《“伏侯在东精力所聚”——田吴炤书事钩沉》认为，《普通教育学要义》为田吴炤移山堂自刊本，并且《移山堂丛书》“名为丛书，收录仅曹元忠辑南朝（宋）盛弘之《荆州记》一种”^[4]，后又增入《普通教育学要义》一种^[5]。然而考察湖北省图书馆藏《明张文忠公全集》、《荆州记》等书，均有田桢“逡山”“逡山老人手校”藏书章，其中《荆州记》牌记镌：“光绪二十有七年荆州田氏移山堂重雕”，书末刻：“皇清光绪二十有七年辛丑嘉平江陵田桢尊父重刊”，下钤“逡山老人手校”印，可知移山乃田桢之堂号无疑。移山堂丛书除《荆州记》外，尚有《初等心理学》清光绪二十八年刻移山堂丛书本、《普通教育学要义》清光绪二十九年刻移山堂丛书本、《生理卫生学》清光绪刻移山堂丛书本三种，均为其子田吴炤的译作，由田桢刊刻成书。

清光绪三十一年，张百熙任学部尚书，奏请天下郡县撰辑乡土志，宣统元年，《江陵乡土志》初步编纂成功。这部《〈宣统〉江陵乡土志》由江陵知县孚保总纂，生员邓宗禹编辑，田桢和王立模负责校订工作，编纂这部乡土志的起因，是“奉提学宪转奉学部札，

命各州县编纂乡土志，以备初等小学教科之采择”^[6]，作为编写初等小学教科书的材料，故其例目一遵学部所颁标准。然编校诸人亦有其创作理念，其《例言》称：“况初等教科一二年，于历史应讲乡土之大端故事及古先名人之事实，于地理应讲乡土之道里建置及先贤之祠庙遗迹等，于格致应讲乡土之动植物各物。”从而保存了当时江陵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量资料。此时田桢已得授国子监学正衔，可惜由于混乱的政局，此书未能刊刻出版，北京大学图书馆今藏其稿本。

三、田桢与新旧教育事业

在光绪二年刊刻的《〈光绪〉江陵县志》中，田桢才“入县庠”，到光绪二十七年，田桢已是年老体衰，其功名仅止于“邑贡生”，到宣统二年编《〈宣统〉江陵乡土志》时，得授国子监学正衔。实际上，田桢还担任过荆南书院监院一职，他在光绪三十二年为同乡田廷俊《拼音代字诀》作序时称：“鄙人自光绪二十九年创办蒙学，每苦幼童识字维艰。今邑中热心教育诸君，又公立半日学堂，欲纳长幼失教之人咸登诸学界，是非简易之法，难期速化之成。适田生廷俊出其所著《拼音代字诀》见示，田生性颖悟，往岁昭文俞幼莱观察在荆南书院创立算学，鄙人监院事，田生肄业其中，积分恒列优等，冥心弹索，几成痼疾，卒获捷秘，持以教人，有事半功倍之效……昔德国书籍，多用古文奇字，至俾士麦以其不便小学，改用通行文字，教育因之普及……近日畿辅多设官话字母学堂，亦不知其字母之学与此代字之学相类与否？吁！世运日趋便易，旧日繁赜之学，其亦知所改图欤？仆老矣，于学问之道无能为役，率弁数言，嘱田生刻诸简端，将以质诸世之识字诸君子。”^[7]

文中“俞幼莱”即俞钟颖，于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任湖北荆宜施兵备道兼荆沙关监督。荆南书院建于康熙五十八年，为荆州府属书院，光绪二十九年改为荆州府中学堂。田桢作为监院，一直致力于地方的启蒙教育事业，他在光绪二十九年就创办蒙学，又和同样热心教育的同乡一起创立了半日学堂，目的不仅在于对儿童的启蒙教学，而且还有对成年人的再教育。田廷俊的《拼音代字诀》受西方拼音文字的影响，用汉字笔画作为字母，就是想解决汉字的繁难问题以推动教育普及，因此得到了他的关注，可见田桢并不拘泥于旧式教育方式，有着更为广阔的视野，他不仅关注到北京正在兴起的“官话字母学堂”，还以德国俾斯麦改革中的通行文字改革为例，认为文字改革能够深刻影响教育普及乃至国家改革，和国家的命运关系匪浅。

四、田桢、田吴炤父子的思想传承

（一）藏书思想

江陵的藏书风气，以北宋荆州田伟、田镐父子开其先。宋祝穆《方輿胜览》载：“田伟。燕人。归朝授江陵尉，因家焉。作博古堂，藏书至五万七千卷，无重复者。黄鲁直过之，曰：‘吾校中秘书，及遍游江南，文士图书之富，未有过田氏者’”^[8]，在当时颇负盛名，其子田镐编有《荆州田氏书目》。而田桢、田吴炤父子也往往将其藏书渊源追溯至田伟，如田桢有“荆州田氏自宋已来藏书之家”藏书印，田吴炤有“田伟后裔”藏书印，均自称为田伟家族后裔。田吴炤藏书处名后博古堂、景伟楼，均表达了对田伟及其博古堂藏书的敬仰之情和绍述之志。可见，田桢、田吴炤父子的藏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惟笔者所见田桢藏书，多为自刻自校，未见有纯以收藏为乐者，是其因少时家贫未能有所规模，还是对书籍重功用而轻收藏，抑或是偏处一隅而散佚殆尽，有待考证。唯一可确定的是，田桢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子田吴炤，促使其走向了藏书访书之路。

（二）新学和教育

田吴炤在近代湖北教育史上有一定影响，在翻译

西学教科书方面尤为突出。据他自述

翻译的经历称：“辛丑、壬寅之际，复东游考究教育，归而肆力于教育学诸书译述，有《初等心理学》、《教育心理学》、《普通教育学要义》、《论理学纲要》、《哲学新论》、《生理卫生学》数种。”^[9]

观察田桢、田吴炤二人的生平经历（见表一），可以发现在西学和教育上的共同兴趣，父子之间的相互影响不可忽视。前已述及，俞钟颖在荆州任职期间，在荆南书院创立算学，这和张之洞在湖北的教育改革是息息相关的，田桢也在这一时期担任荆南书院监院，因此他对新引入的西学和新的教育制度是有一定了解的，从而让田吴炤在两湖书院创办之初就能选拔入学，并在书院内取得优异成绩。光绪二十六年田吴炤自日本留学归国，此时田桢正受荆宜施道观察使夔良之命校刻《明张文忠公全集》，乡居的田吴炤也参与校订，这段时间父子二人在学问上自然多有交流。光绪二十八年田吴炤自日本考察归，田桢开始陆续将他教育考察的翻译成果刊刻成书，并放入自己的移山堂丛书中，可见父子二人对新的西式教育的关注和兴趣是一致的。且田桢在西式教育上具有较为广阔的视野，对国内外的教育改革情况都有一定了解，与田吴

表一 田桢、田吴炤父子清末大事表

	田桢	田吴炤
光绪二十三年（1897）	已任荆南书院监院	入两湖书院
光绪二十四年（1898）		
光绪二十五年（1899）		留学日本成城学校
光绪二十六年（1900）		归国，任湖北自强学堂汉文教习
光绪二十七年（1901）	校刻《明张文忠公全集》； 刻《荆州记》（移山堂丛书）	年底随同罗振玉前往日本考察教育
光绪二十八年（1902）	刻田吴炤所译《初等心理学》（移山堂丛书）	应乡试中举； 翻译《论理学纲要》 翻译并刊刻《西洋史纲》
光绪二十九年（1903）	刻田吴炤所译《普通教育学要义》（移山堂丛书）； 创办蒙学	任省城南路小学堂堂长； 《教育心理学》由商务印书馆初版
光绪三十年（1904）		任湖北学务处审定科帮办 翻译并刊刻《有益游戏图说》
光绪三十一年（1905）		随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
光绪三十二年（1906）	为同乡田廷俊《拼音代字诀》作序	
光绪三十三年（1907）		任暨南学堂总理
光绪三十四年（1908）		赴日本充任游日学生监督及使署参赞
宣统元年（1909）	被选为湖北省咨议局候补议员； 校订《江陵乡土志》	
宣统二年（1910）		
宣统三年（1911）		回到湖北

炤多次赴国外考察、谙熟国外教育制度沿革也不无关系。

不同的是,田吴炤“将译书作为自己进入政界、平步青云的敲门砖和垫脚石”^[10],对于西学采用实用主义态度。田桢虽然同样奉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却是真正应用西学、推进教育的力行者,他自光绪二十九年开始创办蒙学、半日学堂,力图推进知识普及,在参与编纂作教科书之用的《江陵乡土志》时,也运用了新学的编纂观念,重视地方的商业发展和物产情况。他认为:“世运日趋便易,旧日繁赜之学,其亦知所改图欤?”^[11]可见,对于教育改革他是持积极乐观态度的。

五、结语

田桢作为清末江陵乡贤,其所校刻的《明张文忠公全集》及移山堂丛书对于地方文献的保存、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着较为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其影响下,其子田吴炤在藏书、译书方面作出了更大成就,其在日访得之《广唐贤三昧集》、《经进东坡文集事略》等善本,尤为世人所推重,是清末民初有一定影响力的湖北籍藏书家。清末民初的湖北,中西文化交流频繁,如田氏父子一类热衷藏书刻书又能与时俱进、钻研新学的人亦属不少,本文以田桢生平经历为例,见近代湖北士绅之一斑也。

参考文献:

- [1] 蒯正昌.江陵县志 [O].清光绪三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卷三十八:48.
- [2] 瑞.荆州府属投票当选人之调查 [N].汉口中西报,1909-08-21(0002).
- [3] 张居正.明张文忠公全集 [O].清光绪二十七年红藤碧树山馆刻本.湖北省图书馆藏.凡例:2.
- [4] 王亮.伏侯在东精力所聚——田吴炤书事钩沉 [J].中国典籍与文化,2008(4):88.
- [5] 王亮.<田吴炤书事钩沉>摭疑 [C].天一阁文丛第七期.复旦大学图书馆.2009:3.
- [6] 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 [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171.
- [7] 田廷俊.拼音代字诀 [O].清光绪三十二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序言:1-2.
- [8] 祝穆,祝洙,施合金.方輿胜览 [M].北京:中华书局.2003:486.
- [9] 田吴炤.说文二徐笺异 [O].清宣统二年影印本.湖北省图书馆藏.后叙:1.
- [10] 刘荣臻.田吴炤译书行迹考述 [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117.
- [11] 田廷俊.拼音代字诀 [O].清光绪三十二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序言:2.